

“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校注

——新發現的大同雲崗石窟寺歷史材料的初步整理——

宿白

大金西京武州山石窟，即今山西省大同市城西三十里的雲崗石窟。這裏“鑿石開山，因巖結構，山堂水殿，煙寺相望”（水經注卷一三灤水），“石龕之大者，舉高二十餘丈，可受三千餘人，面別鏤像，窮諸巧麗，櫛比相連三十餘里”（續高僧傳卷一曇曜傳）。這偉大工程不僅是我國佛教藝術中的精華，同時也是世界文化史上的巨迹！石窟的營建，據魏書卷一一四釋老志知由北魏文成帝和平年間曇曜請鑿五窟開始。之後，魏書卷六顯祖紀、卷七高祖紀皆記有“幸武州山石窟寺”之事，可以推知其時石窟工程尚在繼續。孝文遷洛以後，關於雲崗石窟文獻記錄極為稀少，而雲崗又係砂岩，石刻銘記不易保存，因此，論北魏孝文遷洛以後的雲崗歷史即感困難。近年來其地雖曾不斷發現北魏和遼代的遺迹遺物，但殘基斷瓦究無法說明當日盛況。一九四七年我參加整理北京大學圖書館所藏善本書籍工作，無意中在繆荃孫傳抄的永樂大典平字韻北平府條（該書題“順天府志”，天津木犀軒李氏舊藏，據北京圖書館趙斐雲先生考訂，係繆荃孫修順天府志時，過錄永樂大典平字韻北平府條的全文）引析津志文內發現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一篇，碑文二千餘言，記述詳細，徵引宏博，所述自唐迄金一段雲崗的興修、設置，正好彌補了雲崗歷史的空白頁，而引用現已佚亡的北魏銘刻和文獻記錄考訂雲崗石窟的時代，也正給今天研究雲崗各個石窟開鑿先後的問題提供了絕好的參考材料，此外以焦山東懸空寺來解釋續高僧傳所記的“櫛比相連三十餘里”和分析大唐內典錄、法苑珠林的錯誤，也都是極為精湛、正確的立論。可是碑文屢次傳抄，脫訛頗多，而又別無他本勘對，因謹就能力所及隨下錄碑文略為臆校。碑文後所附註釋係按碑文順序，摘錄有關文獻和已知的遺迹、遺物與碑文參比疏正：一部分是說明碑文本身；另一部分則為了推測碑文所記的寺院的位置和考訂雲崗興廢的歷史。

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

昔如來出世，為利益一切眾生，故分形化體於無邊華藏莊嚴世界海，微塵刹土隨緣赴，感應現前。當此之時，宝山相（“宝山相滿月之容”和下文“獅子之吼海潮之音”為對文，因知“宝山”下脫一“之”字），滿月之容，有目者皆得見；獅子之吼，海潮之音，有耳者皆得聞。而仇填王暫離法會，已生渴仰，遂以旃檀刻為瑞相，何況示滅鶴林，潛輝鷲嶺，真容莫覩，像教方興，宜乎範金、合土、刻木、繪絲而廣興供養者也。然而慮不遠不足以成大功，工不大不足以傳永世，且物之堅者莫如石，石之大者莫如山，上摩高天，下蟠厚地，與天地而同久，是以昔人留心佛法者，往往因山以為室，即石以成像，蓋欲廣其供養與天地而同久，慮遠而功大矣，與夫範金、合土（按上文例，“合土”下脫“刻木”二字）、繪絲者，豈可同日而語哉。西京大石窟寺者，後魏之所建也，凡有十名，一通示（下文作“通樂”，續高僧傳、開元釋教錄、古今譯經圖記皆記“恒安石窟通樂寺”，因知此“示”係“樂”之訛。參看〔一〕），二靈巖，三鯨崇，四鎮國，五護國，六天宮，七崇教（下文作“崇福”），八童子，九華嚴，十兜率〔一〕。按北史魏太祖道武皇帝拓跋珪

〔一〕 十寺問題

“西京大石窟寺者，後魏之所建也，凡有十名……”，此十名中：通樂見續高僧傳卷一曇曜傳、開元釋教錄卷六、古今譯經圖記卷三、貞元新定釋教目錄卷九；靈巖見魏書卷一一四釋老志、續高僧傳卷一曇曜傳、開元釋教錄卷六、貞元新定釋教目錄卷九；天宮見魏書卷一一四釋老志，其餘都不見宋以前記錄。而上述見於宋以前記錄的通樂、靈巖、天宮，又是否即碑文所記的通樂、靈巖、天宮，也還尙成問題，因此我們推測此十名之說約自遼代開始（參看〔二六〕），金時十名尙存，皇統七年撰此碑文以後，十名會有更改，北京圖書館藏成化山西通志卷五：“石窟十寺在大同府城西三十五里，後魏時建，始於神瑞，終於正光，凡七帝，歷百十有一年。其寺一同升，二靈光，三鎮國，四護國，五崇福，六童子，七能仁，八華嚴，九天宮，十兜率。寺內有元載所修石佛二十龕，區圖關閻圖”（闕文係據北京圖書館藏嘉靖大同府志卷五補，嘉靖志文與成化志略同，疑從成化志出。此後順治雲中郡志卷三、康熙山西通志卷二九、雍正朔平府志卷三、古今圖書集成方輿彙編職方典卷三四六、乾隆大清一統志卷七八、乾隆大同府志卷二五等各種志書所記的雲崗十寺，都是直接、間接因襲成化、嘉靖兩志）。至於十名的荒廢以至無聞的時間，約在明末以前（參看〔二九〕）。

十名又作十寺，似不能簡單解作即是十處石窟，但根據碑文所記“西京大石窟寺者，後魏之所建也，凡有十名”，可知每寺的主要部份，則又都是北魏所建的石窟，因此我們推測這十寺大約和現存清初所建後接第五窟、第六窟的石佛古寺相同（圖版壹，一、二），事實上自第一窟迄第二十窟上面的崖面，的確都分佈着曾經容納木結構的梁孔、椽眼和人字形溝槽等痕跡，這些痕跡高低錯落，時斷時續，由此可推查當時覆蓋在石窟前面各個木建築的分佈情況：

一、第一窟和第二窟曾在一木建築下；

以東晉武帝大元〔“大”當為“太”之訛〕十三〔魏太祖登國元年即代王位，登國元年即東晉孝武帝太元十一年，此“三”係“一”之訛〕年稱王於定襄之盛樂，國號代，建元登國，後乃即真，遷都平城〔二〕，號恒安都〔三〕，今西京是也。二世曰明元帝，三世曰大武帝，四世曰文成帝，五世曰獻文帝，六世曰孝文帝，始都洛陽，改姓元氏，七世曰宣武帝，八世曰孝明帝，孝明之後，權歸藩鎮而魏祚衰矣。魏紀凡建寺皆書而不書此寺，唯獻文紀書：皇興元年八月幸武州山石窟寺〔四〕。又按雲中圖云：文成和平八年、獻文天安元年革興造石窟寺。然未知有何所

- 二、第三窟曾在一木建築下(圖版壹,三);
- 三、第五窟和第六窟曾在一木建築下;
- 四、第七窟和第八窟曾在一木建築下(圖版壹,四);
- 五、第九窟和第十窟曾在一木建築下(圖版壹,五);
- 六、第十一窟、第十二窟和第十三窟曾在一木建築下;
- 七、第十五窟、第十六窟、第十七窟和第十八窟曾在一或二木建築下;
- 八、第十九窟曾在一木建築下(圖版壹,六);
- 九、第二十窟曾在一木建築下。(此外還有幾處較小的遺迹,分佈在第二窟和第三窟之間的碧霞宮、第四窟和第五窟以西的小窟等處的崖面上。)

上述這九或十座較大痕跡是否即碑文的十名、志書的十寺，現雖不能遽下結論，但自第七窟以西迄第二十窟，沿窟口外側又都會掘出排列有序並向南延長的遼代敷地方磚(參看〔二六〕)，上下對照，跡象明顯，似乎也只會這樣推定。又，有的窟口外側在遼代敷地方磚之下，發現北魏時代的建築遺物甚多，因此似又可推知“十名”或“十寺”中有的部份更係上承北魏當時窟前建築的舊基(參看水野清一：雲崗石窟調查記，刊東方學報、京都、第九冊、第十三冊第一分、第十三冊第四分、第十四冊第四分、第十五冊第二分)。

- 〔二〕全部碑文考述北魏歷史和北魏一代的雲崗歷史未據魏書，這種情況正說明當時魏書流傳極少，與邢昺讀書志卷一下所記：“治平中，曾鞏校定隋、梁、陳三書上之，劉勰等上後魏書，王安國上周書。政和中始皆畢頒之學官、民間傳者尙少，未幾遭靖康丙午之亂，中原淪陷，此書幾亡。”完全符合。
- 〔三〕恒安都不見魏書、北史，按孝文太和中置恒州治平城，魏書卷一〇六地形志上：“恒州、天興中置司州，治代都平城。太和中改。”但當時民間却稱作恒安，雲崗第三十五窟窟口東壁銘記云：“維大代延昌元年五月十五日，恒安口口口尉都統革造……彌勒並七佛立侍菩薩，……”所以續高僧傳卷一曇曜傳云：“曇曜住恒安石窟”，此後“此土撰述”的釋氏書記曇曜住恒安，皆從此出。至恒安都一辭則以下文〔一〇〕所引大唐內典錄為最早。
- 〔四〕魏書記幸武州山石窟寺凡五次，北史記幸武州山石窟寺凡兩次。魏書卷六顯祖紀：“皇興元年秋八月丁酉幸武州山石窟寺”(北史卷二文同)。同書卷七高祖紀：“太和四年八月戊申幸武州山石窟寺，庚戌還宮(北史無)……六年三月辛巳幸武州山石窟寺(北史卷三文同)……七年五月戊寅朔幸武州山石窟佛寺(北史無)……八年九月乙未行幸方山、石窟寺(北史無)”。又魏書、北史記幸武州山凡二次，魏書卷七高祖紀：“延興五年丁未幸武州山……太和元年五月乙酉祈雨武州山”(北史卷三文同)。碑文云“魏紀……唯獻文紀書皇興元年八月”一事誤。

据(五)。今寺中遺刻所存者二：一載在護國，大而不全，無年月可考(六)；一在崇教，小而完，其略曰：安西大將軍散騎常侍吏部內行尚書宕昌(暉福寺碑、水經注、魏書皆記太和中慶時爵宕昌公，因疑“宕昌”下脫“公”字。參看(七)鉗耳慶時鑣也，巖開寺(“巖”上疑脫“即”字)。其銘曰：承藉□(原闕，疑為“宏”字)福，遮邀冥慶，仰鍾皇家，卜世惟永。蓋慶時為國祈福之所建也(七)。

〔五〕雲中圖一書不見著錄。按文成帝卒在和平六年五月，圖云：“文成和平八年……革興造石窟寺”疑誤，約即指魏書卷一四釋老志所記：“和平初，師賢卒，曇曜代之，更名沙門統。初，曇曜以復佛法之明年(文成兴安元年初復佛法)，自中山被命赴京，值帝出，見於路，御馬前銜曜衣，時以為馬識善人，帝後奉以師禮。曇曜白帝於京城西武州塞巖山石壁，開窟五所，鑿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飾奇偉，冠於一世”而言。又圖云：“獻文天安元年革興石窟寺。”不知所據。

〔六〕護國問題

碑文記護國的情況計有：

一、“護國二龕不加力而自開”；

二、“東壁有拓國王騎從”；

三、有“大而全，無年月可考”的遺刻。

按雲崗石窟中最为明顯的二龕(雙窟)有二處，一為第七窟和第八窟(圖版貳，一)，一為第九窟和第十窟。第九窟和第十窟供養人行列雕在後室隧道壁，而窟內外也沒有可以鑿刻需要面積較大的銘記的壁面。第七窟和第八窟則在外室東西壁下面都雕有供養人行列(圖版貳，二)，而二龕(雙窟)中間石壁南端外面，即原雕斷下施龜趺的丰碑(圖版貳，三)。此碑經千餘年來的自然剝蝕，不僅文字無存，即碑的形式也不易辨別了，因此我們推測碑文所記的護國，大約就是現在的第七窟和第八窟。

〔七〕鉗耳慶時本姓王名遇，魏書卷九四有傳：“王遇字慶時，本名他惡，馮翊李潤鎮羌也……自云其先姓王，後改氏鉗耳，世宗時復改為王焉……坐事腐刑，為中散，遷內行令、中曹給事中、加員外散騎常侍、右將軍、賜爵富平子，遷散騎常侍、安西將軍，進爵宕昌公，拜尚書，轉吏部尚書，仍常侍，例降為侯，出為安西將軍、華州刺史。”慶時信佛教，太和中修建很多僧寺，可考知者除碑文所記的崇福外，水經注卷一三灑水記他在平城建祇洹舍：“(平城)東郭外，太和中關人宕昌公鉗耳慶時立祇洹舍於東壘，椽瓦梁棟、台壁樞陛、尊容面像及牀坐軒帳，悉青石也，圖制可觀，所恨惟列壁合石疎而不密，庭中有‘祇洹碑’，碑題大篆非佳耳。然京邑帝里佛法丰盛，神圖妙塔架時相望，法輪東轉，茲為上矣。”清木陝西澄城出“大代宕昌公暉福寺碑”，因又知他曾在鄉里建暉福寺，石交錄卷三錄暉福寺碑文云：“我皇文明自天，超世高悟……太皇太后聖慮淵詳，道心幽暢……散騎常侍安西將軍吏部內行尚書宕昌公王慶時資性明茂……於本鄉南背宅上，為二聖造三級佛圖各一區，規崇爽塹，擇形勝之地，臨沃衍据桀剛……伐良松於華賦之陰，撥文璠於荆山之陽，禮功銳巧窈妙極思，爰自注始三載而就，崇基重構，層欄疊起，法堂禪室通閣連暉……太和十二年歲在戊辰七月己卯朔一日建。”綜上兩處記載，知慶時所建都窮極巧思，與魏書本傳所記：“遇性巧，強於部分”相合。宣武初，慶時兼將作大匠，孝文以後北魏所興造的巨大建築，幾乎皆出其手，魏書本傳云：“世宗初，兼將作大匠……北都方山靈泉道俗居宇及文明太后陵廟、洛京東郊馬射壇殿、修廣文昭太后墓園、太極殿及東西兩堂、內外諸門制度皆遇監作。虽年在耆老，朝夕不倦，跨鞍驅馳與少壯者均其勞逸。”

末云：大代太和八年建，十三年畢^{〔八〕}。按道武登國元年即代王位，四月改稱魏王，皇始元年稱帝，天興元年詔羣臣議國號，咸謂國家啓基雲代，應以代為號，帝不從，詔國號魏。天興至孝文至（“至”當為“十”之訛）三年，凡九十載，而碑仍稱代何也^{〔九〕}。參稽內典，矛楯為文，元氏錄云：道武皇帝改號神瑞，當東晉武帝太元元年，立恒安都，於郊西土（大唐內典錄原文作“郊西大谷石壁”，此“土”當為“大”之訛）谷石壁皆剝鑿為窟，東西三十里，櫛比相連^{〔一〇〕}。按神瑞時（依上下文意，疑“時”為“係”之訛）明元所改，歲在癸丑，當東晉安帝隆安十七年，在太元後三十七年矣^{〔一一〕}，其舛誤如此。續高僧傳云：沙門曇曜於文成帝和平中住石窟通

〔八〕 崇福問題

此遺刻現已不存，但依據〔七〕所述，可以推知鉏耳慶時所開石窟一定具有相當的規模，並且雕飾巧麗。按雲崗大窟除第十六窟、第十七窟、第十八窟、第十九窟、第二十窟為曇曜五窟，第七窟第八窟為護國，第三窟非一般石窟外，只剩下第五窟、第六窟、第九窟和第十窟。第五窟、第六窟規模過大，其中第五窟既未按原計劃完成，後又無計劃的補刻（如西壁佈置零亂，釋迦立像北側刻千佛，南側刻彌勒、釋迦、多寶龕，而相應的東壁卻又無千佛。又如南壁後刻的小龕錯落無序，甚至剝平舊龕的一部分），而第九窟和第十窟（雙窟）面積既不過大，也不狹小（圖版參，一），並且它的雕鏤在雲崗石窟中又最稱巧麗（如後室入口雕刻極繁雜的石門和須彌山（圖版參，二、三），前室地面雕蓮花、龜背文，廊柱基雕對象，兩端廊柱上雕須彌山，山上雕束蓮柱、欄杆等（圖版參，四）），這些似都和鉏耳慶時的地位及其營造的風格相符。在時間上，我們從造像服飾上觀察，也和崇福銘記所記“太和八年建，十三年畢”一語吻合（第九窟和第十窟釋迦多著右袒或通肩大衣，此種服飾在雲崗最遲之例恰是太和十三年，即第十七窟明窗東側壁上雕有太和十三年紀年題記的釋迦、多寶、彌勒三像龕），因此我們推測碑文所記的崇福大約即是第九窟和第十窟這對雙窟。

〔九〕 魏書卷三五崔浩傳：“浩曰：昔太祖道武皇帝應天受命，開拓洪業，諸所制置，無不循古，以始封代土，後稱為魏，故代魏兼用，猶彼殷商。”在石刻中集古錄跋尾卷五、金石錄卷二一即錄有大代華嶽廟碑，並詳論魏代兼用之制。清乾隆間河南孟縣出司馬景和妻墓誌，題云“魏代揚州刺史南梁郡太守宜陽子司馬景和妻”，又知魏代可以連用。晚近洛陽發現元鑿墓誌，題云“大代大魏正始四年武昌王”，更知大代大魏連用之例。此大代大魏連文西魏時還通用，如敦煌莫高窟第二八五窟北壁滑黑奴發願文云：“夫從緣至果非積集無以成功，是以佛弟子滑黑奴為識之類，敬造无量壽佛一區……大代大魏大統五年五月廿日造訖。”

〔一〇〕 元氏錄即大唐內典錄卷四後魏元氏翻傳佛經錄的簡稱。內典錄原文云：“道武皇帝魏之太祖也，改號神瑞元年，當晉孝武太元元年也。出據朔州東三百里築城立邑，號恒安之郡，為符秦護軍，擊敗後乃即真號，生知信佛，興建大寺，恒安郊西大谷石壁皆鑿為窟，高十餘丈，東西三十里，櫛比相連，其數眾矣。”

〔一一〕 按神瑞改元歲在甲寅，即東晉安帝義熙十年，若以隆安紀元推算當為隆安十八年，以太元紀元推算當為太元三十九年。碑文所記誤。

樂寺(一三)。大唐內典錄云：曇曜帝禮為師，請帝開石窟五所，東為僧寺，名曰靈巖(一三)，西為尼寺(一四)。不言其名。僧法軫為寺記云：十寺，魏孝文帝之所建也(一五)，護國東壁有拓國王騎從。廣弘明集云，即孝文皇帝建寺之主也。帝王於天宮寺以金銅造釋迦

〔一三〕 通樂問題

碑文記錄通樂並無具體描述，續高僧傳所記的通樂是否即碑文十名中的通樂，我們也無法肯定。續高僧傳卷一曇曜傳原文云：“釋曇曜……少出家，攝行堅貞，風鑿閑約，以元魏和平年任北台昭玄統，綏輯僧眾，妙得其仁，住恒安石窟通樂寺，即魏帝之所造也。”假如道宣所記係北魏實況，即曇曜和平年住恒安通樂寺，則北魏通樂的位置疑不出“曇曜白帝鑿山石壁開窟五所”的曇曜五窟附近，而抗日戰爭期間日人也曾在曇曜五窟前的遼代敷地磚之下，掘出許多北魏甃瓦、甃瓦、蓮花瓦當、指文甃瓦當等建築遺物（參看前引水野清一文）。

〔一四〕 靈巖問題

碑文自“曇曜帝禮為師”以下至“西為尼寺”一段，不見大唐內典錄，係引自廣弘明集卷二魏收釋老志的道宣(?)注文，原文云：“今時見者傳云：谷深三十里，東為僧寺，名曰靈巖，西頭尼寺，各鑿石為龕容千人。”因知靈巖的位置應在東端。但道宣的另一書續高僧傳卷一曇曜傳又記：“去恒安西北三十里武周山谷北面石崖，就而鑿之，建成佛寺名曰靈巖，龕之大者舉高二十餘丈，可受三千餘人，面別鑿像，窮諸巧麗，龕別異狀，駭動人神，櫛比相連三十餘里，東頭僧寺，恒供千人。”似乎靈巖寺又成為全部石窟的總寺名，可以包括東頭僧寺。按魏書卷一一四釋老志云：“景明初，世宗詔大長秋卿白整，準代京靈巖寺石窟，於洛南伊闕山為高祖文昭皇太后營石窟二所。”這伊闕石窟即今洛陽龍門賓陽洞，而賓陽洞的形制和造像與雲崗東頭第一窟迥第四窟完全不同，相反却和今日雲崗西端的曇曜五窟相似，因此可以推知北魏時的靈巖，大約如續高僧傳所記是全部石窟的總名。至於廣弘明集所云靈巖在東頭，約為自唐以來的情況，即如碑文所記十名中的靈巖，它的位置，俗傳是第三窟，大約可信，因為第三窟在雲崗石窟中面積最大，容人最多，並且還在東頭。（參看〔二八〕）

〔一五〕 尼寺問題

〔一三〕引廣弘明集所記的“西頭尼寺”，最早見於水經注卷一三灤水：“武州川水又東南流，水側有石祇迥舍並諸窟室，比丘尼所居也。其水又東轉逕靈巖南，因巖結構，巽容巨壯，世法所希，山堂水殿，煙寺相望。”按雲崗以西傍武州川水現存北魏石窟遺跡有：

- 一、雲崗石窟西南，武州川南岸，即俗稱魯班竈處；
- 二、雲崗西七里吳官屯東，臨武州川的崖壁上；

三、一九五〇年雁北文物調查團所發現的焦山寺，寺在雲崗西三十里高山鎮北面焦山的南坡，與高山鎮隔武州川相對，其地正當自雲崗西來的山崗盡處（參看王遜：雲崗一帶勘察記，刊雁北文物調查報告）。

按這三處不僅都未發現“尼寺……鑿石為龕，容千人”的大石窟，就是可以開鑿那樣大石窟的崖面也似乎都沒有，因此這西頭尼寺的位置現尚無法判斷。

〔一五〕法軫寺記不見著錄。按記云十寺，又云皆魏孝文所建，疑非唐以前作。

像(一六)。眾記參差如此,竟不知經始在於何帝,以竟(“竟”當為“意”之說)推之:道武遷都之後,終其世才十年,其間創立城郭、宮室、宗廟、社稷、百官制度,見於史筆,其事實繁,至於鑿山為寺,理應未暇;道武燬教,末帝雖感白足之言,尋即沮落,亦非其所為也;獻文即位之初幸其寺,則寺興於前矣。其間唯明元、文成二帝;據錄特標神瑞之號,明元實經其始(一七);內典錄明載和平之事,則文成實繼其後矣。彼和明(此係指上文所引廣弘明集,因知“和”為“弘”之說)所記以孝文為建寺之主者,蓋指護國而言也。法軫云十寺皆孝文所建,非也,然則明元始興通樂,文成繼起靈巖,護國、天宮則創自孝文,崇福則成於鉗耳,其餘諸寺次第可知。復有上方一位石室數間(一八),按高僧傳云:孝文時天竺僧旃曇摩(一九)之地也。十寺之外,西至懸空寺,在焦山之東,遠及一舍,皆有龕像,所謂節比相連者

〔一六〕 天宮問題

天宮寺金銅釋迦造像事,係廣弘明集卷二引魏收釋老志文。魏書卷一一四釋老志云:“其歲(皇興元年)高祖誕載……又於天宮寺造釋迦立像高四十三尺,用赤金十萬斤、黃金六百斤。皇興中又構三級石佛圖,檣棟楣楹上下重結,大小皆石,高十丈,鑲固巧密為京華壯觀。”(廣弘明集引文略同)按雲崗石窟中皆造石像,沒有可以容納如此巨大金銅造像的石窟,因此魏書所記的天宮寺是否在雲崗,是否即碑文所記十名中的天宮寺,都尚有問題。至於十名中的天宮,碑文無其他記錄,現無法推測。

〔一七〕 雲崗石窟開鑿的時間問題

碑文所據大唐內典錄文見〔一〇〕。按明元改號神瑞,魏書卷三太宗紀云:“神瑞元年春正月辛酉以禎瑞頻集,大赦改元。”與雲崗石窟無關,並且也和佛教無關,碑文云“明元實經其始”並無根據。石窟的開鑿始於文成和平中曇曜請開五窟,事詳魏書卷一一四釋老志,參看〔五〕。

〔一八〕 上方石室問題

雲崗崗上有二處北魏時代建築遺址,一在第三窟上方,一在第三十九窟(即第二十窟以西的塔洞)上方。一九五〇年雁北文物勘察團在這兩處拾得“傳祚無窮”瓦當、指文瓦當、布文瓦等北魏遺物。抗日戰爭期間日人曾挖掘此兩遺址:在第三窟上方掘出兩堂宇遺址,一南向,一東向,石壁,壁上塗朱色,兩堂宇間出石砌水溝、石獅首、“傳祚無窮”瓦當、素面圓瓦當等;在第三十九窟上方也掘出了堂宇遺址,除出有石水溝、“傳祚無窮”瓦當外,還有陶洗、壺等生活用具和蓮瓣瓦當、指文瓦當,瓦當中有的還塗飾綠釉(參看前引水野清一文)。碑文所記“上方一位石室數間”大約不出此二處。

〔一九〕續高僧傳卷一曇曜傳原文云:“曜慨前陵廢,欣今重復,故於北台石窟集諸德僧,對天竺沙門,譯付法藏傳並淨土經。”當時和曇曜翻經的天竺沙門可考知者有常那邪舍,魏書卷一一四釋老志云:“曇曜又於天竺沙門常那邪舍等,譯出新經十四部。”其外還有西域沙門,吉迦夜,出三藏記集卷二:“雜寶藏經十三卷闕、付法藏因緣經六卷闕、方便心論二卷闕。右三部,凡二十一卷,宋明帝時西域三藏吉迦夜於北國以偽延興二年共僧正釋曇曜譯出。劉孝標筆受。”

也(二〇)。驗其遺刻年号頗多,內有正光五年(二一),即孝明嗣位之九年也。然則此寺之建,肇於神瑞,終乎正光(二二),凡七帝,歷百一十一年,雖輟於太武之世,計猶不減七八十年,何則崇福一寺五年而成,以此較之,不為多矣,錄云魏成於一帝,何其謬歟。此即始終之大略也。自神瑞癸丑,迄今皇統丁卯,凡七百三十四年,此即歷年之大略也。巖嶂崢嶸而西去,長沙(依上下文意,疑“沙”為“河”之訛)浩渺以東來,嵐影相連,波聲不斷,勢壯京邑,潤分林藪,豈特國家之寶,抑亦仙聖之宅,此則形勢之大略也。峰巒後擁,龕室前開,廣者容三千人,高者至三十丈,三十二瑞相,巍乎當陽,千百億化身,森然在目,煙霞供宝座之色,日月助玉毫之輝,神龍天矯以飛遷,靈獸雍容而助武,色相連延則天皇彌勒之

(二〇) 懸空寺和焦山問題

此焦山即〔一四〕所記高山鎮對面的焦山。懸空寺明清以來似尚存在,順治雲中郡志卷三云:“懸空寺,(大同)城西四十里,焦山東。”

(二一) 雲崗石窟中的銘記截止目前已發現二十餘處,其紀年清楚的有:

- 一、太和七年邑畿信士女等造石窟形像九十五區銘記 在第十四窟東壁;
- 二、太和十三年比丘尼惠定造釋迦、多寶、彌勒像銘記 在第十七窟明窗東壁;
- 三、太和十九年銘記 在第十一窟明窗壁;
- 四、太和十九年銘記 在西方某小窟窟口壁;
- 五、太和廿年銘記 在第十一窟西壁;
- 六、景明元年銘記 在西方某小窟;
- 七、正始四年銘記 在第二十八窟;
- 八、延昌元年……造彌勒、七佛銘記 在第三十五窟窟口東壁;
- 九、延昌二年銘記 在第二十八窟;
- 十、延昌四年銘記 在第十九窟西脇窟西壁;
- 十一、正光□□銘記 在第四窟,不知是否即碑文所記的正光五年銘記。按此銘記抗日戰爭期間被拓毀。

(二二) “終乎正光”問題

雲崗石窟現存的紀年銘記中,如〔二一〕所記,正光確是最晚的紀年,從雲崗現存全部造像風格上觀察(第三窟主要造像和自遼以後所修補的造像除外),最晚的作品的確也不能比正光再遲,而當時恒安已漸紊亂,正光四年柔然入侵,圍繞北都的六鎮鎮民相率起義,資治通鑑卷一四九:“普通四年(即正光四年)……及柔然入寇,鎮民請糧,景(武衛將軍于景)不肯給,鎮民不勝忿,遂反,執景殺之……諸鎮華夷之民往往響應。”後三年(即孝昌二年)攻陷恒州,通鑑卷一五一:“普通七年(即孝昌二年)……秋七月……魏僕射元纂以行台鎮恒州,鮮于阿胡擁朔州流民寇恒州,戊申陷平城,纂奔冀州。”此後恒州在“流民”治下者七年,“流民”糧且不濟,雲崗鑿窟造像當然廢止。七年後東魏以及以後的北齊,雖復置恒州,大約荒涼仍舊,所以周併齊後即廢恒州,此種情況以迄初唐。因此,正光以後雲崗已走上由沒落到荒廢的境地,可以無疑,碑文推測“終乎正光”,實是的論。

宮，層簷竦峙則地通多寶之塔(二三)，以至八部之眷屬，諸經之因地，妙筆不能同其變，辯口不能談其目，巧力不能計其數，况若神遊〔此句和下句為對文，因知“遊”下脫一“於”字〕驚嶺，宛如身詣於耆闍，此則(此則之下疑有脫誤)制發响，聞者攝心，琢石則醴泉流出，飲之愈疾(二四)，珍禽時聚，毒虫屏迹，此則灵感之大略也。唐貞觀十五年守臣重建(二五)，遼重熙十

〔二三〕“神龍天矯以飛運，靈獸雍容而助武，色楯連延則天皇彌勒之宮，層簷竦峙則地通多寶之塔。”碑文中形容雲崗石窟只此四句不是一般的描寫：“神龍天矯以飛運”，大都雕在窟口頂部如第一窟、第二窟，或前後室的過道頂部如第十二窟(圖版肆，一)，或雕在須彌山腰部如第十窟(圖版參，三)，也有的雕在窟頂的天花上如第十五窟；“靈獸雍容而助武”，大約係指第七窟、第八窟內室入口兩側壁上所雕的騎有鳥、牛的護法像(鳩摩羅伽天、摩醯濕伐羅)(圖版肆，三、四)；“色楯連延則天皇彌勒之宮”，是形容第九窟、第十窟外室東、西、北壁上部(圖版肆，五、六)；“層簷竦峙則地通多寶之塔”，即指如第一窟、第二窟和第三十九窟等塔廟(制底)窟內正中的多寶塔(圖版肆，二)。

〔二四〕“琢石則醴泉流出，飲之愈疾”，即雍正朔平府志卷三所記的石竇噴水：“左雲縣石佛寺……道東數武有石竇噴水，清冽可飲，行道多藉焉。題曰‘石窟寒泉’，即左雲縣四景之‘寒泉靈境’也。”此寒泉在今俗稱寒泉洞的第二窟的後壁，冬日不凍，俗傳此水可以醫目疾。

〔二五〕唐代雲崗

北魏以後迄唐初，雲崗石窟不見記載，近年雲崗的考古工作也未發現可以肯定是唐代的遺址、遺物，但根據此碑文和文獻記錄，可以考知關於唐代雲崗者有：

一、貞觀移雲中治恒安鎮後的重建

貞觀十四年置雲中治恒安鎮，新唐書卷三九地理志三：“雲州雲中郡、下、都督府，貞觀十四年自朔州北定襄城徙治定襄縣……雲中、中、本馬邑郡雲內之恒安鎮。武德元年置北恒州，七年廢。貞觀十四年復置，曰定襄縣。”次年，即如碑文所記重建石窟寺。

二、唐代雲崗大約和今日相似，但東頭尚存記有北魏對雲崗經營的碑碣。

貞觀十四年重建以後，似會引起關中佛教徒的注意，所以當時著名的律師道宣一再著錄雲崗事蹟。廣弘明集卷二魏收釋老志道宣(?)附注云：“今時見者傳云……(參看〔一三])已還者相次於北。石崖中七里，極高峻，佛龕相連。餘處時有斷續。佛像數量孰測其計，有一道人年八十，禮像為業，一像一拜，至於中龕而死，尸僵伏地，以石封之，今見存焉。莫測時代。在朔州東三百里，恒安鎮西二十餘里，往往來者述之，誠不思議之福事也。”所記“谷深三十餘里……石崖中七里，極高峻，佛龕相連。餘處時有斷續。”與今日情況相似，中七里即自第一窟以東以迄第三十九窟以西一段。又第五窟之西，崖上鑿小窟頗多，俗云寄骨洞，傳為封尸骨處，似也和道宣書中的禮佛道人“至於中龕而死，尸僵伏地，以石封之”有關。續高僧傳卷一曇曜傳云：“武周山谷北面石崖……(參看〔一三])東頭僧寺恒供千人。碑碣見存，未卒陳委。”此碑碣又見大唐內典錄卷四：“恒安郊西……(參看〔一〇])谷東石碑見在，紀其功績不可以算也。其碑略云：自魏國所統貨賦，並成石龕，故其規度宏遠，所以神功逾久而不朽也。”因知道宣三書所記除當時傳聞外，尚根據

八年母后再修，天慶十年賜大字額，咸熙（遼無咸熙紀元，疑“熙”為“雍”之訛）五年禁山樵牧，又差軍巡守，昌（“昌”上脫“壽”字）五年委轉運使提點，清寧六年又委劉轉運監修（二六），李唐已

魏時碑碣，此碑既云在東頭僧寺，又說在谷東，可知與〔六〕所記第七窟和第八窟前的殘碑無關，疑當在第三窟——即推測是十寺中的靈巖附近。至於該碑的佚亡時間已不可考，如貞元新定釋教目錄卷九所記“恒安石窟……東頭僧寺恒供千人，碑碣見在，未卒陳委”可靠的話，則八世紀末還保存未毀。

三、唐初修治雲崗石像和第三窟造像的時代問題

唐代對雲崗的記錄，除上面所引者外，古清涼傳卷上還有一段很重要的記事：“中台南三十餘里，在山之麓有通衢……傍有石室三間……近咸亨三年儼禪師在此修立……儼本朔州人也，未詳氏族，十七出家……其道業純粹，精苦絕倫，景行所覃，并部以北一人而已。每在恒安修理孝文石窟故像……以咸亨四年終於石室。”由此可知，石窟佛像唐初曾事修治。按雲崗石窟造像從其形式、風格上考察，屬於北魏以後、遼金以前所雕造的，只有第三窟的阿彌陀倚像和他兩側的脇侍，不過此組造像近人多論為隋像（參看梁思成等：雲崗石窟中所表現的北魏建築，刊中國營造學社彙刊第四卷第三、四合期），可是隋在雲崗並無重建記錄，且當時恒安荒廢已久，其地已淪為雲內縣屬的一小鎮（恒安鎮），就一般情況推測，似乎沒有修鑿如第三窟高三十餘尺巨像的條件，因此，我們根據碑文所記唐初重修和上引儼禪師故事兩事，疑這第三窟造像時代與其推為隋，實不如假定初唐為宜。

（二六）遼代雲崗

根據近年來的調查、清理，以及抗日戰爭期間日人的挖掘，我們逐漸清楚遼代在雲崗工程浩大，和碑文所記遼興宗、道宗、天祚屢次重修符合。當時的工程由雲崗以東的觀音堂、佛字灣起，以迄於雲崗西三十里的焦山寺。工程內容有：

一、寺院的營造

1. 觀音堂、佛字灣一帶的營造 乾隆大同府志卷十五：“觀音堂、府城西十五里佛字灣，遼重熙六年建。明宣德三年修，萬曆三十五年重修……國朝順治六年姜瓖變焚燬，八年總督佟養量重建。”志云重熙六年建，係據觀音堂所存明人碑記。又現在觀音殿內尚存遼代所彫觀音石立像一軀，而觀音堂及其附近又散佈着許多遼代的溝文磚，這些事蹟，都可証實府志所記。觀音堂西石崖上刻巨大的雙鈎佛字（此為佛字灣地名的山來），此佛字約也是遼代遺迹（參看前引王遜文）。

2. 雲崗石窟前的營造 前面〔一〕所述遼代十寺的位置，經近年的發現已大部分証實：一九三三年興建雲崗別墅時在第五窟前面西側發現遼代石礎檣（參看前引梁思成文）；抗日戰爭期間日人在第八窟、第九窟、第十一窟、第十二窟、第十三窟前和壘臺五窟前的現在地面下掘出遼代敷地方磚、溝文磚、獸面瓦當、迦陵頻伽瓦當、羽狀文瓦當、陶片和瓷片等；又在第五、第四窟之間的龍神廟掘出遼代獸面瓦當、羽狀文瓦當（圖版伍，一）、瓷器片和鐵器等（參看前引水野清一文）；一九五三年雲崗保養所清理自第十六窟以西窟外地面，也曾發現遼代磚瓦，其中較重要的一件事，是在第二十窟東側已毀的石壁上發現殘存的磚砌短垣一段，短垣用磚和第二十窟頂所覆的遼代溝文磚相

前虽無遺蹟，以近推远从可知也，此則歷年之大略也（按上文已述歷年之大略，此處疑有脫誤）。本朝天會二年度之口口口尔雅云：石山戴土謂之崔嵬。此山是山外積黃壤，中含翠石，高卑莫測，厚薄難知，然而良工預為其制，羣匠爭奮其力，迄（迄下疑有脫字）隳坏，續用有成，虽大禹之鑿龍門，六丁之開蜀道，不过摧其頑險，务於通達而已，方之以此，未足為難，倘非誠心一發，聖力潛扶，安能至是哉。又護國二窟不加力而自開，以至扣地則神鍾。（此句疑有脫誤）大軍平西京，故元帥晋國王到寺隨喜讚歎，曉諭其兵，不令侵擾，并戒綱首，長切守護，又奏特賜提點僧禪紫衣并通慧大德号，九年元帥府以河流近寺，恐致侵擾，委煙火司差夫三千人改撥河道，此則皇朝外護之大略也。嗚呼，青鴛肇於西域，徒見其名，白馬興於中土，景（“景”疑為“竟”之訛）墮其志，未如此寺殊功聖迹，亘古今而常存者也。先

同，这样，這兩處磚砌遺跡就可把第二十窟釋迦坐像背光上的梁孔聯繫起來（圖版伍，二），一方面可以肯定這梁孔是遼代按裝木結構時所鑿；另一方面也可指出第二十窟窟頂的崩毀，是在遼人重修以前。由於以上這些發現，我們已可推斷遼人在這些石窟之前都興建了巨大的木建築（其中有的是因襲了北魏時代的舊基，參看（一）），而這些巨大木建築又都是後接窟室的。

3. 魯班窯前的營造

一九五二年於魯班窯（兩座北魏所開的石窟）前發現大量的遼代磚瓦，這說明遼人在這裏也營造了寺院。

4. 焦山寺的營造 一九五〇年在焦山南坡和焦山寺東側都發現了遼代溝文磚，遼人不僅在這裏營造，並且還就北魏石窟中蝕毀的佛像重新泥塑，寺第二層東大窟中的釋迦塑像上還殘存有五代北宋時代常用的石綠彩色。

二、造像的修整

遼代在雲崗石窟中修整造像規模也很宏大，第十三窟南壁下部佛龕座上的遼代銘記內有：“修大小一千八百七十六尊”一句（該銘記據前引水野清一文知有“契丹”“耶律”字句。因知為遼代所刻。按此銘在抗日戰爭期間被拓毀），可以推知。就現存遺跡觀察，知道當時修整，有的在剝蝕的石像外面泥塑，有的就空白石壁（？）補刻，前者數量較多，如第三十五窟東壁的釋迦坐像（圖版伍，三）和第十一窟西壁七佛的最末二尊（圖版伍，四）。此二尊佛像在抗日戰爭期間被搗毀，後者較少如第十一窟中心柱南面的左右脇侍（圖版伍，五）。

三、造像的彩飾

自第十四窟以西的造像上，多有如前述焦山寺遼塑上的石綠彩繪。這種石綠，在第三十五窟東壁釋迦坐像後面的石綠背光中，得到了直接的時代的證明（圖版伍，三）。因為該背光花文是遼代流行的網目文和菱文。這種花文又見於大同城內下華嚴寺清伽教藏中遼塑釋迦的背光（參看前引梁思成文）、遼寧義縣奉國寺七佛殿梁枋上的遼代彩畫（參看關野貞等：遼金時代の建築と其佛像、版圖上冊）和內蒙林西遼慶陵東陵後室陽馬上的彩畫（參看村田治郎等：慶陵）。

是亡遼季世，盜賊羣起，寺遭焚劫，靈巖棟宇，掃地無遺（二七）。皇統初，緇白命議，以為欲圖修復，須仗當仁，乃請惠公法師（按“惠”下文作“慧”）住持。師既駐錫，即為化緣，富者樂施其財，貧者願輸其力，於是重修靈巖大閣九楹，門樓四所，香厨、客次之綱常住寺位（此句疑有脫誤），凡三十楹，輪奐一新，又創石垣五百餘步，屋之以瓦二百餘楹，皇統三年二月起工，六年七月落成，約費錢二千萬。自是山門氣象，翕然復完矣。師又以靈巖古刹既為灰燼，護國大碑又復摧毀，勝槩不傳，居常歎息，欲表前蹤，以垂後世，乃礪巨石，謁文於予。予既聞師名，又嘉其志，遂不復辭，為據實而書之。師名稟慧，姓王氏，弘州永寧人，幼於天成縣幽峰院出家受具，自十八歲講華嚴經摩訶演論，辯折（“折”疑為“析”之訛）疑微，听者常數百人，四十五散徒遊方，即其所傳（此句疑有訛誤），天眷元年奉聖旨傳菩薩戒，皇統三年轉運司定充本寺提點，申行台尚書省繼准唐堂帖。師性明悟，威儀端重，一方欽仰，建化之功頗多，至於石窟為最玄（“玄”當為“云”之訛）。皇統七年夷門曹衍記并書（二八）。

〔二七〕 遼末雲崗之毀

遼天祚保大二年自中都南逃雲中，經雲崗入天德軍，三朝北盟會編卷五：“宣和四年（即天祚保大二年）……正月十四日（阿骨打）以勁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里，至其中都攻之，自旦至日中，遂陷焉。始謂天祚在城中也，及破，乃知天祚聞其來，中夜已竄……女真即失天祚，因遣追兵出平地、松林，亦將西至鴛鴦泊，則適與天祚遇，天祚大窘，因倉皇從雲中府，由石窟寺入天德軍。”（同書卷二十二引亡遼錄所記略同）而金兵銜尾追逐，官軍焚擾，大同城內寺院如華嚴寺、普恩寺（即今善化寺）都遭燬壞，金大定二年僧省學重修薄伽教藏記云：“至保大末年，伏遇本朝大開正統，天兵一鼓，都城四陷，殿閣樓觀俄而灰之。”（此碑現存下華嚴寺薄伽教藏內）金大定十六年朱弁西京大普恩寺重修大殿碑記亦云：“大金西都普恩寺自古號為大蘭若，遼後屢遭烽燧，樓閣飛為埃粉，台殿聚為瓦礫，前日棟宇所僅存者十不三四。”（此碑現存善化寺三門內）城內如此，城外可知，天祚西竄所經過的石窟寺更不能例外，所以碑文云：“先是亡遼季世，盜賊羣起，寺遭焚劫，靈巖棟宇，掃地無遺。”前面所記的十寺大約或多或少都遭到破壞，而以靈巖遭遇最慘。

〔二八〕 金代雲崗

關於金代的雲崗文獻無徵，就碑文所記可知者有：

一、天會間宗翰的保護

“故元帥晉國王”即據北宋徽欽兩帝的宗翰（粘罕），翰天會六年攻下遼西京以後，一直到天會五年，常駐西京，金史卷二太祖紀：“（天輔六年三月）宗翰……已巳至西京，壬申西京降……乙亥西京復叛……四月辛卯復取西京……（七年六月）宗翰為都統……駐兵雲中。”同書卷三太宗紀：“（天會三年十月）宗翰兼左副元帥……自西京入太原……（四年三月）宗翰還西京……（八月）庚戌宗翰發西京（同書卷七四宗翰傳：“（五年）宗翰還師山西……（六年）復取徐州”）……十年……以宗翰為國論右勃極烈兼都元帥。”同書卷四熙宗紀：“（天會十三年）宗翰為太保領三省事封晉國王……十五年……七月……宗翰薨。”碑

傳菩薩戒提點大石窟寺沙門稟慧。助辯經武將軍前西京軍器庫使騎都尉太原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王慶祐。前西京(京下當有脫文)(二九)

文記(天會)九年元帥府改撥河道,大約也和宗翰有關,此改撥的河道,即今武州川水自第三十九窟以西繞雲崗堡南側東流的河道。

二、皇統間稟慧修復靈巖

稟慧修復的靈巖現已無存,其位置當在已毀的靈巖舊址。近年在龍神廟以西的清理調查,從未發現可以肯定是金代的遺址、遺物,而龍神廟以東石窟前面擁有面積較大的平地的,只第三窟一處,由此似更可証實〔十三〕關於唐以來的靈巖在第三窟這個推論。

三、建立“重修大石窟寺碑”

即此碑,皇統七年立。此碑元末尚存,所以析津志作者熊自得(道光丰城縣志卷十六:“熊自得字夢祥,橫岡人……元末以茂才異等荐為白鹿書院山長,授大都路儒學提舉崇文監丞,以老疾歸,著有析津志。”)可以抄錄全文。明成化山西府志卷五所記“始於神瑞,終於正光”即根據此碑,又記“金皇統間修”(參看〔一〕),疑也據此碑而言,清初志書(自順治雲中郡志以下)雖還照抄成化嘉靖兩志,但刪去“金皇統間修”一語,可以推知當時對金代修建的事蹟已泯沒不傳,依此推察此碑之廢或在明中葉而後。又康熙山西通志卷五:“武州山……武州川水出焉,峪中有石窟寺,魏孝文帝常幸焉。山下有耿氏三塚,金皇統間建塔(同書卷二八作皇統四年),上有誌,父曰光祿,子曰銀青,孫曰昭勇。”此事雖與本文無關,但雲崗金代遺跡稀少,因附記於此。

〔二九〕自元代以後的雲崗

一、稟慧所修靈巖元末尚存

按析津志引碑文於“前西京”下接“癸卯年臘月二十四日予自東勝來,是日宿於寺之方丈,受清供,次日達西江。次年二月八日始錄上草本於何尚書思誠東齋。”碑文撰年是皇統七年丁卯,上距癸卯計二十四年(即金天會元年),下距癸卯計三十六年(即金大定二十三年),因知此段非曹衍碑文,而是析津志作者熊自得自述旅程的記錄,該癸卯應是元順帝至正二十三年。由這段旅程記錄,可証熊自得至正二十三年臘月二十四日曾親至稟慧所修的靈巖,並宿於靈巖方丈受清供,由此推定元末此靈巖尚存。

二、雲崗的元代遊人題記

雲崗石窟現存元人墨書題記二處:一在第四窟,一在第三十三窟,前者已漫漶不甚可辨,後者有大德、至正等紀年。

三、曇曜五窟前發現的長方磚

抗日戰爭期間日人挖掘和一九五四年雲崗保養所清理時,都曾在曇曜五窟前遼代敷地方磚之上發現遼金以後所敷的長方磚地面,這長方磚地面,我們懷疑它與〔一〕所論明末以前十名尚存有關係。十名尚存則必有修繕,而這長方磚約即遼金以後修繕十寺的殘存遺物。至於修繕的時間,根據磚的形制,最遲似不能下及明初以後。

四、明末以前的雲崗

明代大同淪為邊防,雲崗似又行荒廢,包括上述金元靈巖在內的雲崗十寺,這時都逐漸毀壞,以至泯滅無聞,毀壞的絕對時間我們雖不能指出,但從雲崗現存的明代遺跡、遺物上推察,知約在明末以前。雲崗現存的明代遺跡、遺物有:

1. 嘉靖三十七年所建、萬曆十四年修葺的雲崗堡城 在崗南；
2. 嘉靖四十三年“雲崗堡碑” 現存石佛古寺內；
3. 萬曆二年所建的土城 在崗上；(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抄本光緒左雲縣志卷三：“雲崗堡……新舊二堡，舊堡設崖下，嘉靖之戊午也，因北面受敵，議移岡上，萬曆之甲戌也。舊者仍留，以便行旅，新者尚土築，女牆係磚包，共高三丈五尺，週圍一里五分。)
4. 萬曆十九年所立的開山歷代祖師墓塔(圖版伍，六) 在崗上土城東北隅；
5. 萬曆四十八年吳伯與“石佛寺碑” 現存石佛古寺內。

其中萬曆十九年所立的開山歷代祖師墓塔更比較明顯的暗示了明末以前雲崗寺院的恢復。而吳伯與石佛寺碑所記：“奇樹蔭樓閣以葱蘢……方岳玄中張公命酒其上。” 当即指恢復以後的雲崗寺院的建築。

五、明清之際的雲崗和現存的石佛古寺

崇禎十七年二月李自成率起義民兵進駐大同，三月留過天星張天琳守雲崗，五月當地地主武裝勾引清兵屠殺雲崗，明末以前恢復的雲崗寺院又遭摧毀，所以自順治元年迄順治三年曾重修雲崗石佛寺，光緒左雲縣志卷十所收重修雲崗石佛寺碑記詳記此事：“雲崗以甲申三月為闖寇過天星盤踞……余不揣螻臂，馳軍士千人於五月朔十日一舉而克復之，生縛過天星，寸磔以快雲嶺（“嶺”疑為“鎮”之訛），使非慈雲慧月之照，何以有此，因感佛土當淨之義，於是鳩工庀材，重修以董厥事……是役始於甲申月（“月”前原缺數字），迄於丙戌五月，凡兩年而役竣。”（此碑縣志佚撰人，原碑今已佚，所記起義民兵事又見順治雲中郡志卷十二：“崇禎十七年甲申春，闖難陡發，偽兵西來，二月二十九日鎮城主將迎降，在城留住六日，殺明宗室殆盡，三月初六日兵過陽和，留住一宿，東行鎮城，所留偽總兵張天琳，號過天星……兩閱月而國威東震，陽和軍民約與鎮城軍民內應，於是殺天琳及偽中軍張黑臉，恢復大同，時五月初十也。”）此次重修疑即因明末以前寺院舊址。重修後五年，即順治八年總督佟養量等人又大事修葺，順治雲中郡志卷三：“石窟十寺……總督終於順治八年率屬損貲大為修葺，俾殿閣樓台香積禪林，金碧瑩煌，巍然雁北一勝境也。”修葺後所立石碑現存石佛古寺內，石佛古寺即現存後接第五窟、第六窟的雲崗寺院，而這雲崗寺院——石佛古寺，就其建築形式和佈置上觀察，当即此順治年間重修、修葺的雲崗石佛寺。至於寺內現存康熙三十七年、乾隆三十四年、咸丰十一年、同治十二年、光緒二年五碑所云的重修，約都不出增補、修整的範圍，也就是說，順治以後雲崗的建置已沒有較大的變動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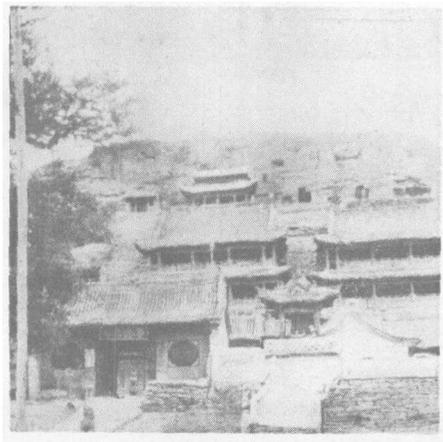
一九五一年三月整理

一九五六年一月改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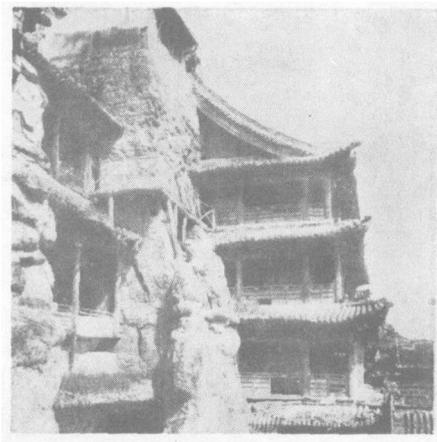
圖版所用照片，大部都是北京大學一九五一年至一九五四年考古專門化同學實習所攝，也有一小部分是北京大學考古教研室舊藏。附有*號者係據東方學報、京都、第九冊所刊前引水野清一文中的插圖翻照。

圖版所用綫圖，皆作者速寫並未实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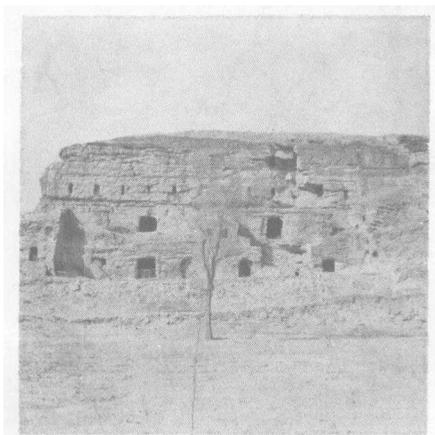
作者附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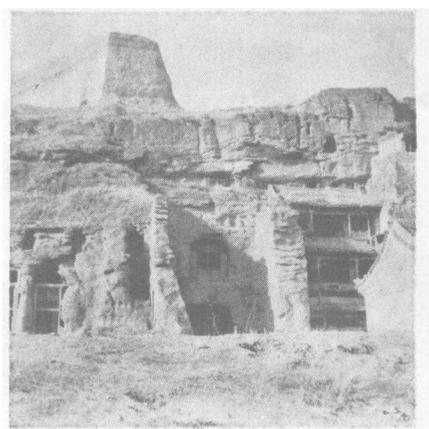
一、現在第五、六窟前的“石佛古寺”



二、第六窟前清初所建木建築側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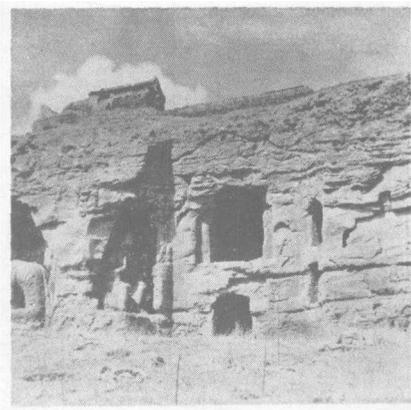
三、第三窟崖面上的梁孔



四、第七、八窟崖面上的椽眼和人字形溝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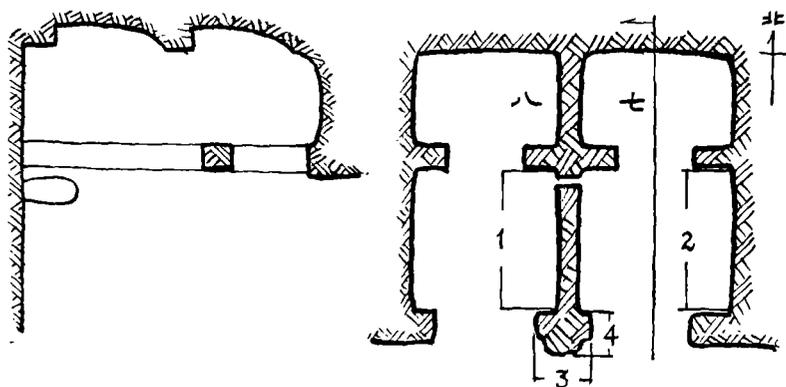


五、第九、十窟崖面上的梁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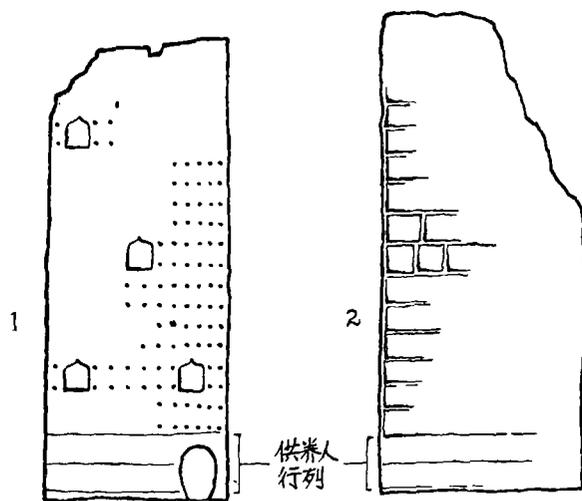


六、第十九窟崖面上的人字形溝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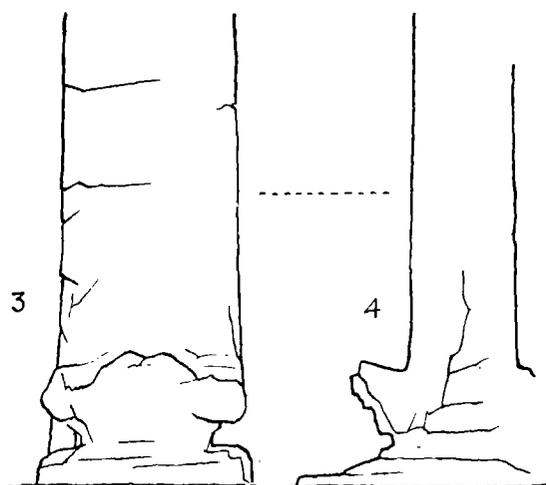
圖版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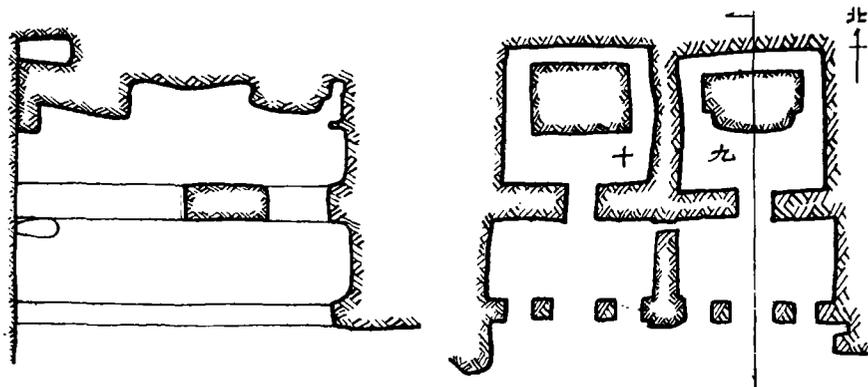
一、第七、八窟平面和第七窟剖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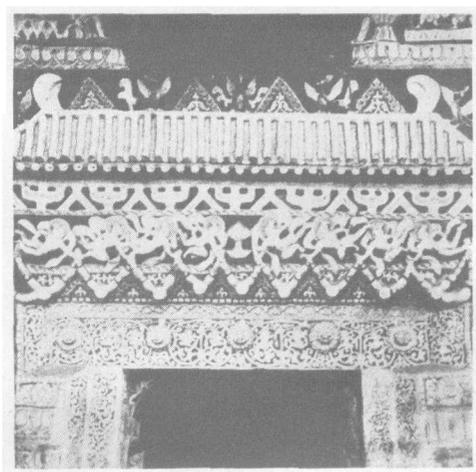
二、第七、八窟前室東壁壁面佈置(參照圖版貳,一)



三、第七、八窟前室外面的豐碑殘迹立面和側面(參照圖版貳,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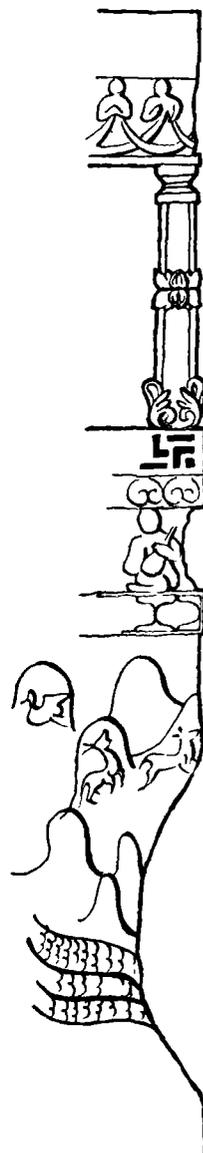
一、第九、十窟平面和第九窟剖面



二、第九窟後室入口上面的石門雕刻



三、第十窟後室入口上面的須彌山雕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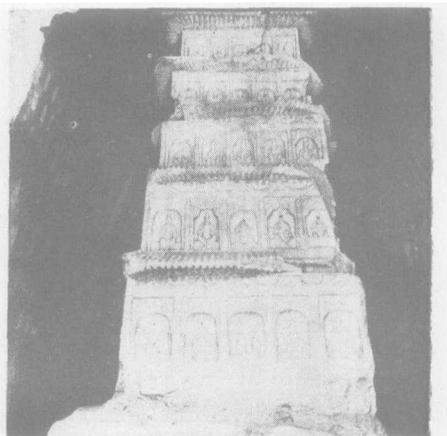


四、第九窟前室東端廊柱雕刻速寫

圖版肆



一、第十二窟窟口頂部的交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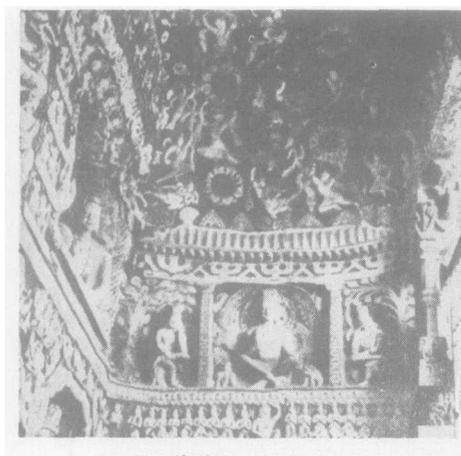
二、第三十九窟窟內的多寶塔



三、第八窟後室入口西側的護法像(鳩摩羅伽天)



四、第八窟後室入口東側的護法像(摩醯濕伐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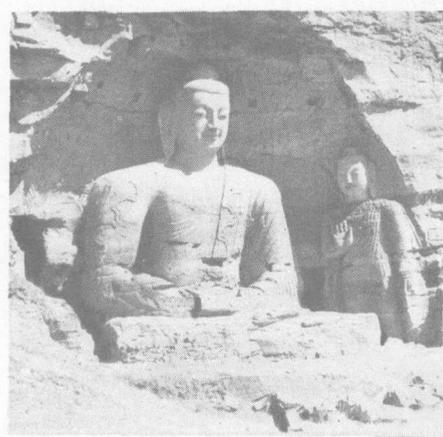
五、第九窟前室上部的“彌勒之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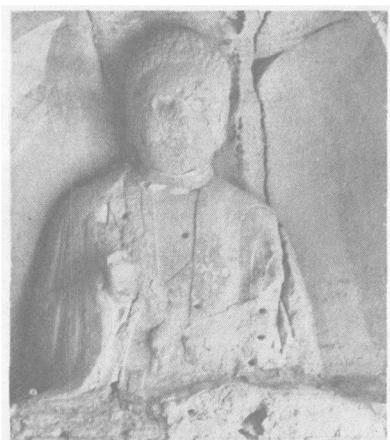
六、第九窟前室北壁上部的“色攝連延”



一、抗日戰爭期間日人在龍神廟附近掘出遼代瓦當、甃瓦的堆積情況*



二、第二十窟釋迦坐像背光上部的梁孔



三、第三十五窟東壁遼塑釋迦坐像和遼彩繪背光



四、第十一窟西壁七佛，最末二尊為遼塑



五、第十一窟窟內中心柱南面遼刻脇侍速寫



六、雲崗崗上土城東北隅萬曆十九年的開山歷代祖師墓塔*